

周作人作品集

钟叔河能将其视为知己并且惺惺相惜的人恐怕寥寥,湖南人民出版社前总编辑朱正算一个。他们的友谊贯穿了几乎整个当代史。他们同年同月生,同时进入《新湖南报》,一起被打成右派,又关在同一个农场改造。朱正研究鲁迅一辈子,钟叔河则自称周作人的拥趸。

对钟叔河来说,他更欣赏更为平和的周作人。他最早知道周作人,是在解放前的课本读到《金鱼》《故乡的野菜》等文章。到了上世纪60年代,钟叔河已被报社扫地出门,一家老小寄身在澡堂,白天靠拉板车度日,晚上在如豆的灯下读当作废纸买来的“旧书”,看到了报纸上的《儿童杂事诗》,于是尝试着与作者通信。

在小店买来的极薄而劣的红色横格材料纸上,他写道:“说老实话,先生的文章之美,固然是对我具有无上的吸引力,但这还不是我最爱读它们的最主要的原因。我一直认为,先生的文章的真价值,首先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,乃是上下数千年来中国读书人最难得有的态度,那就是诚实的态度:对自己,对生活,对艺术,对人生……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,都能够诚实地,冷静地,然而又是积极地去,去看,去讲,去想,去写。”

他请周作人为自己写一幅字。

周作人回信了,写下了这段话:“在一个短时间内,如我们愿意,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。正如在古代火炬竞走——这在路克勒丢斯看来,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——里一样:我们手里持炬,沿着道路奔向前去,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,追上我们,我们所有的技巧,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,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。”

后来钟叔河费了许多力气,编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完整的周作人作品集。他觉得周作人身上的自然、平和是有建设性作用的。

周作人给他的影响是,“我既不是佛教的信徒,也不是基督耶稣的信徒,我只相信知识和伦理。”“尊敬父母、尊重老师,是对的;学生去打老师、知识越多越反动,那是不对的。只有常识、知识是超时空的。真理其实是很平凡的东西。”

回想自己26岁从报社出来,在社会上拖板车,他很快摆正自己的位置,怀才不遇,郁郁寡欢,都没有发生。他有异于常人的生存能力,命运阻挡他一下,他总能转个弯,再越出去。

钟叔河也觉得从来没有委屈过自己,在街道工厂,妻子朱纯成了五级木模工,他成了六级绘图工。他乐于做这些事情,从微小生活里发现巨大的乐趣。即便是坐牢,他也说,自己其实没吃过什么苦,因为心里是清楚的,并不是自己的错。

到晚年,女儿和他说,希望爸爸多休息,享享福。钟叔河大发脾气,看书、写书,就是最想做的事,就是享福,难道吃喝玩乐才是享福吗?他不抽烟、打牌,不讲究吃穿,就是看书、写文章、校对过去的出版物。

相识、相知、相爱

“我一直认为我找了朱纯,是我的一个成功。讲起来,我其实原来有些自私。我没有结婚的时候,那时候半开玩笑,但是也反映一些倾向,就是说找老婆,我有一条,就是她的工资不能比我低,为什么呢?我是一个大花钱的人,我有一个钱用一个钱,好吃东西,喜欢买书……我和人建立家庭,她的收入如果很少,她就要管你的钱——那不能不管,家庭里有小孩要养啊,她如果收入跟你一样,就比较大方了,就不会盯着你的钱全要交上去,那这里矛盾就会减少很多。当年朱纯比我大两岁,工资



钟叔河的编辑工具



学者钟叔河

20世纪80年代,他编辑出版“走向世界丛书”,收集整理1840年至1911年间中国人到欧美、日本通商、留学、出使、游历和考察留下的日记、笔记和游记,在当时的出版界产生巨大影响。

当时,“文革”结束不久,这套书以宽广的视角,记录了近代中国人第一次睁眼看世界的模样。100多年前的钦差官员、驻外使节、出访学者,身在域外,怀揣着问题,以如饥似渴的心情,注视着一切先进事物。这套丛书出版之时,中国人再一次踏上了“走向世界”的征程。

“一个国家、民族,恐怕不应该也不可能长期和别的国家、民族隔绝开来,不能够自绝于这个世界。”正是这种思想,使得钟叔河经历了阿·托尔斯泰说的,“苦难的历程”。



1981年,钟叔河和妻子朱纯合影

和我同为十八级。”钟叔河笑着说。

“当然首先还是两个人要有共同语言,首先还是要找能够跟自己同甘共苦的人。”钟叔河认为,理想的夫妻关系,就是对方都成为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,没有她就不行,而且事实上,也不是另外一个人可以替代的。那样的家庭就是一个稳固的家庭。

“我就觉得她好,她对我好,我对她也是好的。我们在报社那时候都年轻,我27岁,她29岁,都还年轻,当右派的时候我受的处分是很重的,她如果不是我的配偶,也可能划右派,但是不会处理得那么重,但是她从来都没有埋怨过我。这是很容易埋怨的呀,说就是你,要你不这么去讲这些东西,怎么会害到我们。她从来没有埋怨过,就这一点,她比我的耐受性还强一些。最后都得搞劳动谋生,她做木模,她评级是五级木模工,做模型做得很好的。”

钟叔河并非感觉到有社会主义

务,才会想去传宗接代,或者长辈要自己去传宗接代。“我作为一个人,自然到了时候,就需要有一个家庭,需要有妻子,我是讲真话,我是这么一个人。”

老人们喜爱的打麻将、唱歌、跳舞,钟叔河从不沾边。老伴朱纯在世时,在客厅安放一张台球桌,他最多只肯和老伴打打台球。朱纯过世了,他也一年比一年老,正好作为懒的借口,以前一个月下楼一趟去理发店,现在叫女婿来家里帮忙,连这个都省下了。有时读者寄来一大包书要签名,他实在没力气去提,就原封不动寄回去。

他最不爱傍晚去公园散步,“碰到的全是跟我一样为苟延生命锻炼身体老年人,彼此看见像照镜子,互相提醒日子不多了。所以我宁愿去前边看工人修路,那地方尘土飞扬乱哄哄,但气氛比公园好得多”。

但他的思绪并没停下,每天读书看报,对外界信息的掌握非常及时,哪里修路建桥都知道。



钟叔河的书架

《念楼学短》

钟叔河自己也没想到,他晚年所写的《念楼学短》,初版只印3000本,2020年后浪出版公司再出,卖了10万多本。

钟叔河说,这本书的初衷,只是给孙女读书做引导用的,大概相当于文言文的导读和今译。他住在二十楼,于是称自己的居所为“念楼”。

清人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》“秋果”一节:“七月下旬,则枣实垂红,葡萄缀紫,担负者往往同卖,秋声入耳,音韵凄凉,抑郁多愁者不禁有岁时之感矣。”

“念楼读”曰:“七月秋风起,枣树上挂的果渐渐变红,架上的葡萄也越来越现紫了。到月底这两样便开始上市,在水果摊子上总挨在一起,紫紫红红,十分好看。小贩们叫卖吆喝声,本是市声中热闹分子,可是在秋风中听起来,不知怎的却似乎带着一丝凄凉。尤其在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,它会使你想起,一年容易,又是秋天了。”

随手写来,并不做作,而文情俱胜,正恰到好处。这是周作人称赞苏轼的话,放在这里似乎也合适。钟叔河说自己写得很少,写不出时,绝不硬写,这样写出来的东西,虽然不好,至少不会太丧失自己的本色。喜欢的文章也是自然大雅,“其反面即是梳妆打扮,装模作样,这本是一切文章的大忌,能够用简简单单几句话,把自己的意思或情愫朴素地传达给对方,那就很好的。”

豆瓣上有人评价,“饶有趣味,短小精悍,像老朋友随手发的朋友圈合集。”

在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工作的王平,今年72岁,38岁才进入出版社,住在钟叔河家楼下。住得近,和这位老先生心也近。在他看来,长沙人有两种脾气,一是讲经世致用的经院作派,一是打得转麻将,骂娘撒泼对生活投入无限热情的市井作派。王平和钟叔河也谈文论理,但谈得更多的是生活里的屁话、琐碎的话、下里巴人的话,为了学术上一件小事,吵几个轮回。

因为工作的关系,王平在北京见过很多大家,身上气味和钟叔河不同。钟叔河有一种趣味、野味,两种气贯通圆融,这得有一颗平常心,用市井小民的方式去思考知识分子的问题。

钟叔河也从来认为自己的学问很少的,一种外文都不懂,“现代不懂外文的,基本上都不能算知识分子,因为任何学科都全球化,不了解水平动向,怎么能搞专门的学问。”不过,这并不妨碍可以有自己的历史观。历史里闯荡的人,心灵须有超乎常人的承受能力,还得时时感叹人生的渺小和虚无,稍不小心压垮你的,不是浩如烟海的学问,而是对人类本身本性的怀疑与忧患。

钟叔河关心的问题没有那么多宏大词汇,“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,生活可以过得更好一点吗?社会能够有更多的进步吗?”

“人类历史本身永远是在进步的,因为人在进化。但是人人有的弱点,并不完美,人类到现在,无论是对每个个体而言,还是对人类全体而言,它都远远没有达到完善的程度。人的进步的动力是什么呢?我认为人和生物,都在追求更好的生活,这就是社会进步的动力。现在没有人愿意退回去过北京猿人的生活,社会进步的动力应该是人都追求比较好的生活,所以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所做的努力,从本能来讲都是善的,这是生命的价值。”钟叔河说道。(龚菁琦来源:《人物》杂志)